

现代学术史上的“陶诗品第”之争

杨熹

齐梁时期的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将陶潜列入中品，激起过后世不少非议。清人王士禛就直截了当地指出，陶潜“宜在上品”，表明随着时代风气的递嬗，人们对于陶诗的评价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现代学术史上，围绕着“陶诗品第”的话题，又再度引发一大批学者展开讨论。这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促使学者从各个角度研讨《诗品》及陶诗在流传、接受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重新梳理这桩公案的始末，也不难发现传统学术研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重要特征。

从“宜在上品”到“本在上品”

这场争论最初起源于古直在1926年出版的《陶靖节诗笺》，书中提到：“考《御览》五百八十六引钟嵘《诗评》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是则今传《诗品》乃后人错乱之本，以此蔽罪钟嵘，嵘不任受矣。”古直对自己的新发现极为得意，在两年后刊行的《钟记室诗品笺》中又再次重申，就此正式揭开这场论争的序幕。

古直的“新发现”在令人惊讶兴奋之余也不免心存疑惑：《太平御览》并非罕见之书，难道千百年来无人觉察，尚待今人发覆抉微？可细究之后，就能明白事出有因。早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对基本文献的考索并不充分。郭绍虞在1933年发表的《诗话丛话·钟嵘〈诗品〉》中就认为“其书在宋以前犹不甚显，故唐宋类书，除本有诗话性质者，如《吟窗杂录》等，间或节引数语以外，余如《艺文



古直留影

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均未见称引”。此文发表已在古直《诗品笺》出版之后，竟然仍有如此疏漏，足证当时的《诗品》研究者对《太平御览》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正因如此，古氏之说甫出，立即得到很多人的赞誉和肯定。胡小石在《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中认为：“钟嵘原来是把陶公置于上品的，我的根据并不是近日流行的《诗品》的版本，乃是在《太平御览》第五百八十六卷文学类引《诗品》的地方。明明上品列有十二人，陶渊

明正是其中之一。”从时间上判断，极有可能是直接采纳古氏之说。叶长青在《诗品集释》的《导言》中说道：“今本《诗品》陶潜列在中品，而《太平御览》所引则在上品。”在中品“宋征士陶潜”条则径直征引古直的意见。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也提到：“《太平御览》五百八十六引钟嵘《诗评》（《隋书·经籍志》亦作诗评），原将陶潜放在上品。安知我们现在的传本，不是后人的窜乱呢？”方、古两人交谊深厚，这段评述显然源自古说。庞俊在《享乐录》中也述及古直《诗品笺》，“据《御览》卷五百八十六证明陶本在上品，今本《诗品》在下品者，乃后人所窜乱。此条尤精。大抵校注旧籍，要必有如此者数事，乃可谓有功古人耳”，不但称赏古氏发潜阐幽，还将其著作奉为典范。

古直依据宋人所编《太平御览》，有力地“证明”在《诗品》原书之中“陶公本在上品”，从而将萦绕在前代众多评论家心头的疑惑和不满一扫而空。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内，这一“新发现”就迅速得到众多同行学者的认可和接纳。可是，问题真的就这样迎刃而解了吗？

是“后人窜乱”还是“明人妄改”？

对于这个“新发现”，也有学者持保留意见，钱基博在《钟嵘〈诗品〉校读记》中就不指名地批评过古直，只是并无正确可信的证据。既然古直主要依据《太平御览》的引录，就有批评者对此进行复核。罗根泽《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在论及《诗品》中陶潜的排名时发现“通行本《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六引列上品，但宋本仍列中品”，可惜只提到《太平御览》的通行本与宋本之间存在差异，对于孰是孰非并未明确评判。汪辟疆在《读常见书斋小记·明人妄改〈诗品〉》中，通过比较《太平御览》传世诸本的引录情况，判定古直所依据的并非宋本，而是明清以来的刻本；并进而推断将陶潜列入上品诗人的名单之中，乃是明人在刊刻《太平御览》时妄改原文所导致的结果。

依据宋本和通行本《太平御览》之间的差异，似乎很轻易就能将古直驳倒。不过古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疏漏，实乃情有可原。罗根泽、汪辟疆提到的宋本《太平御览》，要迟至1935年底才由商务印书馆根据日本所藏宋本予以影印出版。此前在中国本土流传最广的是嘉庆年间的鲍崇城刻本，虽然标榜“全依宋本，不改一字”，其实并未呈现宋本原貌。因此，即便古直所凭借的确实是鲍刻本一类的明清刻本，也是受研究条件所限，对此应具了解之同情。况且，古直做出那样的误判，也事出有因：一方面，极有可能误以为鲍刻本呈现的就是宋本原貌；另一方面，无论是鲍刻本还是宋本，在开列《诗品》上品诗人的名单之后，紧接着都征引了其中五位诗人的评语，在曹植、刘桢、张协、阮籍等四位上品诗人之后，就是陶潜的评语。这样的征引方式本身就容易令人滋生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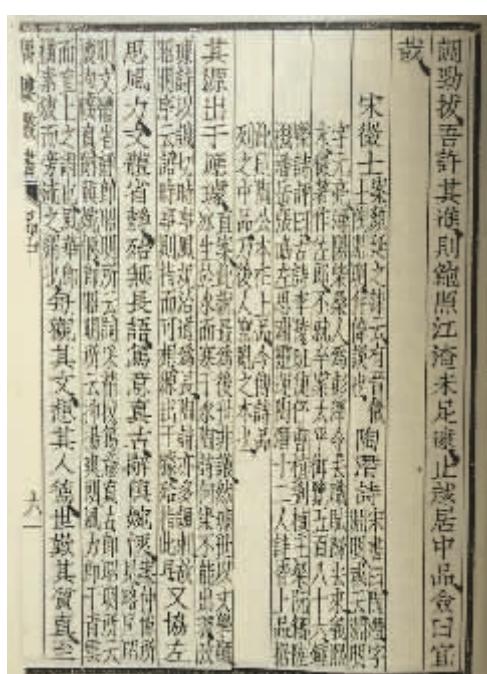
汪辟疆与古直等人意见相左，但就研究方法而言，都是藉助宋人所编类书来进行考察。这

种方法先天就存有缺陷，前人在校勘时早就强调不可轻易采信类书。况且就算是宋刻善本，《太平御览》的编纂距离钟嵘撰写《诗品》之际也已相隔近五百年，站在古直等人的立场，完全可以反唇相讥：即使陶潜的姓名未见于宋本《太平御览》所开列的上品诗人名单，“安保不是后人窜乱乎”？

晋宋诗风与《诗品》义法

仅据宋本《太平御览》来驳斥“陶公本在上品”的看法，显然未必行之有效，因而另有学者尝试从晋宋之际的创作、评论风气入手进行研讨。汪辟疆在《明人妄改〈诗品〉》中又结合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述晋宋时期的创作风尚，以及颜延之、萧统等人表彰陶潜的重心所在，分析陶诗风貌迥异于时风；而《诗品》对于陶潜的评价也明显带有节制，“其有意抑扬，语有分寸，亦未可与上品曹植、谢灵运诸家平品之语等量齐观也”，联系当时的风气嬗变来考察钟嵘对陶诗的认识。逯钦立在1947年发表的《钟嵘〈诗品〉笺考》中也同样认为：“钟嵘为评，实难列之上等，何者？世俗嗜好之所限也。”强调陶诗虽受后世尊崇，但在当时并不具有代表性，因而钟嵘绝无可能将其置于上品。伍叔傥在上世纪50年代的讲稿《文心雕龙札记》中也指出，若将陶诗列入上品，“是无视六朝的品味”，“虽然好友古直（字公愚）指出引入宋本《太平御览》的《诗品》把渊明归为上品之列，我还是难以赞同”。

汪、逯、伍等人从大处着眼，避免以偏概全的一隅之见；但其前提是钟嵘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必须顺应晋宋时期的诗坛风尚。这也很容易遭到对手的质问：难道钟嵘就不能挑战当时普遍的审美观念？因此，由最初的文献复核转向对时代风气的考察，仍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需



左图为商务印书馆影宋本《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六引录的钟嵘《诗评》；右图为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宋征士陶潜”条。